

# 中国化、世俗化与世界化 :司徒雷登的大学教育观

曹金祥 冯春英

**摘要:** 民国时期,司徒雷登因担任驻华大使而一度成为美国在华利益的代言人。但作为燕京大学的创始人和校长,司徒雷登曾长期致力于中美文化交流并以兴办教会教育为己任。在融合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他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和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极力倡导燕京大学的中国化、世俗化和世界化改造,不仅成功铸造了燕京大学的辉煌,使之成为众多教会大学中的翘楚,而且推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和中西文化交流。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推行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是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果,是民国时期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司徒雷登;燕京大学;高等教育;大学教育观;中国化;世俗化;世界化

**中图分类号:** G64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717(2018)01-0099-06

**收稿日期:** 2017-09-29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独立评论派与民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研究”(17YJA880003)。

**作者简介:** 曹金祥,男(1967-),山东成武县人,菏泽学院人文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冯春英,菏泽职业学院讲师。

五四前后,随着西方思想文化的迅速东来和中国教育体制的新旧更替,西方宗教势力在华兴办教育事业也呈现蓬勃发展之势,教会大学开始进入在华发展的黄金时期,成为中国高等教育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在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教会大学中,由司徒雷登掌校的燕京大学独树一帜,业绩斐然,成为20世纪上半叶与国立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并列的著名学府。对于燕京大学取得的办学成绩,不仅南京国民政府多次予以褒奖,当时的教育界也给予了高

度评价,认为“现在之燕大,非特于全国学府中首屈一指,即于国际学府中,亦增一新生力军”<sup>[1]</sup>。曾来华留学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燕京大学在校长司徒雷登的带领下成为其他12所基督教大学的排头兵。”<sup>[2]</sup>

在近现代中美关系史上,司徒雷登是一个在政治、外交和文化教育等多个层面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历史人物。由于担任过驻华大使并在国共之争中偏袒南京政府,其形象长期被定格为美国侵华利益的重要代言人。近年来,随着民国高等教育史研究的深入,司徒雷登的在华教育活动引起了学界的关注,部分学者发表和出版了一些较有影响的学术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在总结燕京大学发展历程的基础上,肯定了司徒雷登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的地位。但由于起步较晚等客观原因,学界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高等教育改革成就的研究要么因陋就简,一笔带过,要么以事功梳理代替思想言说,忽视了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推动作用,遮蔽了燕京大学之所以走向成功的内在原因。在当前中国高等教育面临转型的背景下,根据新近出版的有关文献资料,对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的高等教育改革进行探究和梳理,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意义,而且具有直接的现实参考价值。

## 一、彻底的中国化:维系燕京大学生存发展的基本前提

教会大学虽然以传播西方宗教文化为目的,但要想在中国扎根立脚,必须取得中国社会的认可,使自己的存在具备正当性和合法性。而欲达此目的,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彻底的中国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民族主义浪潮的汹涌和中国本土高校的迅速崛起等因素也“从不同的角度,或迫使或引导基督教大学进一步中国化”<sup>[3]</sup>。

司徒雷登认为,燕京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

之所以在中国得以设立和维持,“多有赖于热心之基督徒为之助力也”<sup>[4](P25)</sup>。而这些中国信众对基督教大学的最大希望,是盼其能够为自己的国家培养出一批具有爱国之心的有用之才,以完成内强家国、外御强敌的民族复兴任务。基于这种分析,他提出,燕京大学要想在中国生存和发展,首先要考虑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在司徒雷登看来,虽然目前中国正处在强敌的威胁之中,但由于人民的国家意识已大为加强,“苟中国完成大统一,则决无畏惧日本之理”,现在国家危难之际正是燕京大学师生为国家独立和建设效力之时,只要全体青年学子能以中国现实需要为急务,“认清欲于将来改革国家社会,应于今日首先改革自己”<sup>[4](P26)</sup>,并且在校学习期间即能“养成一种高尚之人生哲学”<sup>[4](P25)</sup>,培养出“创造的,独立的,勇敢的,合作的精神”,最终必能实现“服务祖国,拯救同胞,为中国全民族谋福利”的远大目标。

在从办学理念上倡导燕京大学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同时,司徒雷登也从实践层面上采取了一系列旨在推动燕京大学中国化的具体举措。

在司徒雷登看来,要实现燕京大学的中国化,关键是要取得中国政府的认可。在司徒雷登之前,在华投身高等教育事业的外国传教士不乏其人,虽然他们也有人意识到,基督教教育事业“在中国须造成一个强有力的独立的系统”<sup>[5]</sup>,但对教会学校融入中国国家教育体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缺乏基本的预判和认知。后来,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大多数教会大学担心“教师和学生双方都有被孤立于国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险,从而失去影响”<sup>[6]</sup>,才不得已被迫向中国政府注册立案。实际上,早在1921年,司徒雷登就已经开始考虑燕京大学的立案问题。1925年11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出台公私立学校均应注册的规定后,司徒雷登就积极着手筹备燕大的注册事宜。对于教会内部的不同意见,他认为,燕京大学“既以服务中国为宗旨,就得遵守中国政府的法令”<sup>[7](P62)</sup>。在他的坚持下,燕京大学排除困难,分别于1926年11月和1927年12月向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申请立案,并得到批准,成为在中国境内立案注册最早的教会大学。此举不仅使燕京大学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对美国托事部的依赖关系,也为燕大在中国的生存和发展及其以后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制度层

面的保证。

在完成燕京大学立案注册的基础上,司徒雷登推动燕大中国化的第二个重大步骤,是更换学校的领导层和调整教师队伍的中外籍教师比例。这种人事制度方面的改革既是燕京大学立案后对中国政府的一种承诺,也是学校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司徒雷登在后来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对于燕京大学,

“我最初的想法是,让更多的中国人参与到学校的管理中来,包括它的教育、宗教、财政等各个方面,使燕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的大学”<sup>[8](P57)</sup>。注册立案后,他即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于1929年推荐中国学者吴雷川出任校长,自己改任校务长。尽管由于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的地位和威望,学校实际上的掌权者一直是其本人,但校长人选的换马既满足了中国政府的要求,也减轻了燕京大学对美国教会的依赖程度。资料显示,除校长职位外,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燕京大学几乎所有的院、系领导均换由中国人担任。全部校董会34名成员中,中国人占到21个,当时政界和学界的知名人物如孔祥熙、颜惠庆、胡适等人也受邀成为燕大董事会成员。

在一般教师构成上,燕京大学初创时,中国籍教师只有陈在新和李荣芳两位博士<sup>[9]</sup>,中外教师比例严重失衡。为了尽快消弭燕京大学的纯西方色彩,并切实提高其办学水平,司徒雷登不惜以重金聘请陈垣、许地山、顾颉刚、钱穆、俞平伯、吴文藻等国内著名学者来燕大任教。由于燕大付给教授的薪水较高,且不存在欠薪现象,因此,一些著名学者甚至托人主动上门求职。如1938年下半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就曾通过郭绍虞的私人关系在燕大谋得“客座教授”的兼职,燕京大学因为旧人关系,对周作人“月给一百元报酬,比一般的讲师表示优待”<sup>[10]</sup>。经过努力,到1934年,在燕京大学拥有的111名教授和副教授中,中国人已达67人,占比超过半数以上。至此,司徒雷登要让燕京大学成为一所真正的中国大学的愿景已变为现实。在他看来,让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参与到燕京大学的教学和管理中来,不仅是为了满足中国政府对教会学校的要求,而且可以充分调动中国教职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学校的管理效益。更为重要者,司徒雷登认识到“国家之间的互相了解是确保世界和平,

并最终形成某种形式的世界共同体的重要保证”，而“燕京大学所创造的环境，能作为一种永久的财富，来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sup>[8](P58)</sup>。

在调整中外教师比例构成的同时，司徒雷登极力扩大学校的招生范围，争取尽可能多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年学子对燕京大学的认可。他认为：“一个理想的大学，首先要做到全国性的，因此，招生的对象，不能仅限于华北一隅，须遍及各地”。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燕大的学生很多来自不同省份的边远地区甚至穷乡僻壤，其招生辐射范围一度远及南洋各地。这些来自不同区域的学生“彼此交流而攻错之，各取他人之长，以补自身之短”<sup>[7](P63)</sup>，极大地提高了燕大的学生培养质量，也在客观上提升了燕京大学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 二、积极的世俗化：消除燕京大学宗教色彩的重要举措

司徒雷登领导下的燕京大学在致力于“彻底的中国化”的同时，为了顺应五四后中国社会日益强势的民族主义诉求，同时也为了更加有效地满足青年学生的求知渴望，在消除宗教性、强化世俗性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举措。

司徒雷登是一位基督教传教士，其来华的主要任务和使命是传播基督教福音，最终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但司徒雷登深谙中国国情和文化，他深知，要想在中国成功传播基督教，首先要让基督教教义适应中国环境和民众需求。为了避免“被冠以利用教育的形式来从事宗教宣传的帽子”<sup>[8](P53)</sup>，司徒雷登履职燕京大学校长后，在处理教育和宗教的关系上确实费了不少周折。他明确表示：燕京大学“虽然在性质上是一所宗教学校，但我并不想让它牵涉到传教运动”<sup>[8](P53)</sup>。基于这种考虑，司徒雷登推动燕京大学世俗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将燕大的办学宗旨由宣传宗教和培养传教士，转变为“以教授高深学术，发展才、德、体、力，养成中国国民领袖，应中华民国国家及社会需要”<sup>[11]</sup>。在新宗旨的指导下，燕京大学以开明为本，不强制学生参加宗教活动，也不以是否信仰宗教来衡量学生的好坏。在宽松的学术氛围中，学生的“学术研究没有被强烈干涉过，要是你愿意，你可

以从马克思研究到三民主义，五权宪法。”<sup>[12]</sup>1926年10月，北洋政府教育部在“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影响下，曾明令禁止学校以传播宗教为宗旨，而燕京大学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宣布取消宗教仪式和宗教课程，将原设的神学院改为宗教学院，使其成了一个不再招生的纯粹的研究机构。

除课程改革外，燕京大学在学科建设上也采取积极措施以淡化宗教色彩。司徒雷登认为，要使燕京大学快速地融入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途径就是要为中国社会培养一大批实用人才，因此，必须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他提出：尽管教会大学的大多数学生往往因为经济原因而无法接受文科教育，但“无论如何，职业课程是最重要的。”<sup>[13]</sup>在他看来，燕京的教育目的“不是为培养什么人才以从事某种政治经济活动”，而是要“养成一种合作、建设、服务人群的精神以服务社会国家”<sup>[14]</sup>。为了将燕大建成“现在中国最有用”的大学，司徒雷登将发展职业科目作为学科建设的首要选择。在他的主持下，燕京大学陆续兴办了农业、陶瓷、制革、家政、新闻和医护等实用学科。统计资料显示，在职业技术型课程发展高峰的1927至1928年间，燕京大学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已经占到总数的26%<sup>[15]</sup>，从而为中国社会培养了一大批具有职业技能的社会急需人才。

除了人才培养外，现代大学的另一个重要职能是社会服务。近代以降，随着基督教世俗化倾向的日益加强，在华传教士认识到，教会大学要获得中国政府的认可，保持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同步性，必须肩负起改造民众、革除陋习和改善风俗的责任。换言之，“只有通过社会服务才能在宗教信仰与社会之间搭建起桥梁”<sup>[16]</sup>。在此背景下，为了推动燕京大学尽快与中国基层社会建立密切联系，司徒雷登在建校之初，即开始了社会服务的积极探索。1922年，燕京大学创建了社会学系和社会学专业，聘请在华首创社会服务的北平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步济时任主任，面向基层民众举办平民夜校、运动场，开展各种类型的知识宣讲和社会调查活动。为了提高社会服务的知名度，增强社会服务的针对性，1925年，司徒雷登将社会学系改名为“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并增设了社会学理论和社会调查方面的课程。1928年至1936年间，社会学系还牵头整合校内其它相关专业的师资力量，先后在河北省清河县和山东



省汶上县开办了乡村社会实验区,除开展相关研究工作外,还具体从事“儿童福利、职业训练、公共卫生、公共娱乐、体育、造路等实际工作”。由于燕大师生在清河等地的乡村实验活动成绩显著,发展迅速,“国内外参观者,与国联专员及省政府代表,均谓该区改造农村之技术尚属合宜;以此小小费用,结果诚为难得。”<sup>[17]</sup>。除了走出校门参与社会服务外,司徒雷登还支持师生在校内成立了社会学研究社。该社在其创办的刊物《社会问题》的前言中明确提出,研究社的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当前的社会问题,以求解决的方法”<sup>[18]</sup>。在这一办刊宗旨的指导下,该杂志发表的文章也大多涉及社会教育改造、农村合作运动等热点问题。

与国内其他教会大学明确反对学生参加爱国运动的做法不同,燕京大学在对待本校学生参与政治运动方面实行了极为开明的政策。司徒雷登认为,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自己的理想并不抵触,因此,他对中国学生为反对外国列强而掀起的爱国运动深表同情,并在实际行动上“对爱国学生运动表示了包容、保护和支持,使燕大一度成了北平学生运动的主要阵地”<sup>[19]</sup>。1925年5月上海五卅惨案的发生,使得全国“民气大张,加深了一般民众对教会、教会学校的厌恶”<sup>[20]</sup>,但燕大的学生救国会却在全国率先成立了“五卅惨案后援会”,积极在北京为死难工人募捐,并派员赴上海支援工人的反帝爱国运动。远在美国为学校募捐的司徒雷登听闻消息后兴奋有加,认为燕京大学的爱国主义热情已经深得人心,两次写信予以褒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司徒雷登甚至亲自带领数百名燕大师生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在1931年的“一二·九”运动中,自美国返程的司徒雷登在上海刚登岸,就向迎接人员打听北平学生的南下请愿情况,当得知大部分燕大学生均已到南京参加请愿运动时,他兴奋地说:“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他在事后对学生的演讲中再次指出:“苟令今日之中国学生在国难时期中而不谋救国之道者,则国家也至无希望也。”<sup>[21]</sup> (P188) 纵观司徒雷登对于学生运动的言行,不难看出,他事实上是将支持学生运动作为燕京大学参与中国社会发展和向世俗化转进的一个重要举措。

### 三、坚定的世界化:确保燕京大学跻身一流的重要途径

强化合作交流,主动与世界著名高校进行校际合作,是现代大学走向成功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外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司徒雷登在大力推动燕京大学中国化的过程中,为了提高燕大的办学水平和影响力,将其迅速带入世界高水平大学之列,在国际化方面也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

燕京大学国际化努力最成功之处,是与美国哈佛大学合作共建了享誉全世界且至今仍在运转的哈佛燕京学社。哈佛大学是美国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有着丰富的办学经验、先进的教育理念和良好的教学、研究条件,在国际学术界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力和知名度,与其合作办学不仅可以提高燕京大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术研究水平,而且可以提升燕大在国际学界的地位。而哈佛大学为了扭转美国在汉学研究方面落后于欧洲国家的不利局面,在客观上也有与燕京大学建立合作关系的需要。因此,“哈佛、燕京两校出于各自的利益,对建立一种新型的合作关系都非常积极。”<sup>[22]</sup>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司徒雷登经过积极斡旋,不仅从铝业大王查尔斯·霍尔的遗产中为燕大争得了150万美元的办学资金,而且巧妙地接受了哈佛大学原定与北京大学的合作项目。经过协商后,1925年,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达成共建“哈佛燕京学社”的合作意向,由霍尔基金会拨款640万美元作为研究和活动基金。1928年1月,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双方在签署的合作协议中,将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列为重点研究对象,把传播和保存中国文化定为首要目的。双方还约定,由学社出资“资助出版那些经学社董事会赞同的有关中国学方面的研究成果”<sup>[23]</sup>。

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燕京大学的中国学研究所也于同年2月宣告成立。司徒雷登为了广揽人才,每年为研究所划拨10万元经费,聘请著名学者陈垣任所长,许多知名学者如顾颉刚等人鉴于燕大稳定的学术环境和丰厚的薪金待遇也欣然应聘<sup>[24]</sup>。两个机构成立后积极开展合作研究,当年即开始互派研究生。资料显示,1949年前中方受学社经费资助前往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者即有11人之多<sup>[25]</sup>。其中

齐思和、翁独建、周一良、王钟翰、杨联陞等人后来都成为造诣深厚、声名远播的学界名流，极大地提升了燕京大学的学术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同期，美国方面受学社经费资助来燕京大学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则超过了17人，其中的戴德华、赖肖尔、饶大卫、费正清、史华慈等人学成回国后，各自“活跃在不同的高校或研究机构，逐渐成长为中国研究领域的专家与学者”<sup>[26](P261)</sup>，从而极大地拓宽了哈佛大学汉学研究的领域，奠定了美国在中国学研究方面的领导地位，使美国逐步超越欧洲而成为中国文化研究的重镇。

在教师交流方面，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则通过互换教师和增加“访问学者项目”等方式以加强学术沟通。这种教师互访互换制度使得“中国学者和西方学者之间通过合作能够建立起良好的学术关系，并增强各自的研究能力”<sup>[26](P267)</sup>。除了开展师生交流外，燕京大学还积极利用哈佛燕京学社提供的充裕经费，积极从中国本土聘请著名学者来校开展研究。1942年10月，燕大在成都复校时，甚至还邀请到陈寅恪、萧公权、吴宓和李方桂等学术大师担任特约教授。燕京大学除了每月为其开出450元的高薪外，还专门为每位学者提供七千美元的专项经费用以学术研究和成果出版，从而使“燕京大学对于中国文化研究方面，能在中国基督教大学中居于领导地位”<sup>[27]</sup>。

哈佛燕京学社的成立和成功运行“被誉为民国时期校际合作的成功个案，是燕京大学与哈佛大学校际合作的实践成果之一”<sup>[26](P87)</sup>。本次合作给哈佛和燕京这两所高校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可以说是一次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经典合作。

除哈佛大学外，燕京大学也积极与其他海外高校开展办学合作。如燕大社会学系的创建得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大力支持。燕京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办则得到了美国密苏里大学的帮助。密苏里大学不仅提供了办学资金，还“把美国新式新闻教育介绍至中国”，使得燕大新闻系在短短五年时间里“各方面都渐渐充实起来，成为国内著名的新闻教育机构。”<sup>[28]</sup>除美国之外，司徒雷登非常推崇英国牛津大学极富影响力的导师制。在他的努力下，两校于1937年合作开办了导师制及荣誉课程，并借以争得英国政府的资金支持。除此之外，燕京大学还争取

到了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的奖学金项目，资助燕大毕业生到相关国家攻读研究生；与德国开展横向合作，每年从德国为燕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争取到可观的办学资金。

燕京大学世界化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从国外广泛招收教师和学生。司徒雷登为了将燕京大学建设成是一所国际性高等学校，不仅尽量招收国外学生，而且还从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瑞士等不同国家和地区招聘外籍教师来华任教。这些来自世界各地、国籍不同、信仰各异的任课教师与中外学生和平共处，不仅促进了文化交流，也推动了不同国家间友好关系的发展。

综上所述，司徒雷登的国际化战略极大地推动了燕京大学的发展，对于提高该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其在国际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均发挥了重要作用。截止到1928年，在短短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就已经确立起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是年，美国加州大学在对亚洲高校的学术水平进行调查后，将燕京大学列为全亚洲最好的两所基督教大学之一，“并认定燕大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进入美国的研究生院攻读学位”<sup>[21](P93)</sup>。燕京大学世界化努力的成功，不仅推动了西方教育理念和教育制度在中国的落地生根，为转折期中国高等教育体制的建构提供了经验参考和模式遵循，而且也有效地推动了中西文化交流，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打开了方便之门。

#### 四、结语

燕京大学作为中西文化融合的结果，虽然只存在了三十多年时间，但它取得的办学成就举世瞩目，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亮丽风景线。如果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的历史”<sup>[29]</sup>，那么燕京大学高等教育改革的成功无疑凝结了司徒雷登的教育思想。换言之，燕京大学创造的成就，除了适逢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大好时机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司徒雷登的高等教育思想和实践。

五四以降，西方思想文化的迅速东来，极大地激发了中国民众民族意识的觉醒，导致民族主义思潮由一股潜流而发展成为蔚为壮观的时代大潮<sup>[30]</sup>，在

此背景下发生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了在华基督教大学”<sup>[31]</sup>，给这些学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如何因应中国的民族主义诉求，在急剧变动的政治环境中继续维系教会教育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是每一个教会大学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与同时代其它教会大学领导者消极应对甚至大唱反调的做法不同，司徒雷登基于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深刻了解，在经办燕京大学的过程中，积极利用和创造各种有利条件，较好地消解了教会大学与中国政府和社会间的张力，科学地建构了基督教文明、西方教育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框架，通过中国化、世俗化和世界化的努力，推动燕京大学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教会学校而转型为一所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著名高等学府。

众所周知，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大学是借鉴西方教育思想和办学模式的产物，但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赋予高等教育以开启民智和建构国家的双重历史使命，“大学已被普遍视为是国家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sup>[32]</sup>。民国时期司徒雷登在燕京大学推行的高等教育改革，顺应了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推动了民国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对于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 参考文献

- [1] 张铨. 祝司徒先生六十大寿[J]. 燕大友声, 1936(9): 34-35.
- [2] 费正清. 费正清中国回忆录[M]. 闫亚婷, 熊文霞,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 86.
- [3] 肖会平. 合作与共进: 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对华活动研究(1922-1951)[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4.
- [4] [美]司徒雷登. 我所见的中国问题[J]. 燕大友声, 1937(6): 25-26.
- [5] 刘廷芳. 司徒雷登: 一个同事者所得的印象[J]. 人物月刊, 1936(2): 105-112.
- [6]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 440.
- [7] 王揆生. 张伯苓与司徒雷登(下)[J]. 上海文化, 1947(12): 61-63.
- [8] [美]司徒雷登. 在华五十年[M]. 李晶, 译. 南京: 译林出版

社, 2015.

- [9] 陈礼颂, 程曦. 建校经过[C]//陈明章. 学府纪闻: 私立燕京大学. 台北: 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2: 5.
- [10] 周作人. 知堂回想录[M].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8: 346.
- [11] 王学珍, 张万仓. 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1861-1948[M].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24-627.
- [12] 唐海. 记司徒雷登[J]. 燕大双周刊, 1946(17): 150.
- [13] [美]司徒雷登. 原来他乡是故乡: 司徒雷登回忆录[M]. 杜智颖,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 [14] [美]司徒雷登. 对燕大希望[N]. 燕京新闻, 1934-12-18(1).
- [15] 章开沅, 林蔚. 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M].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175.
- [16] 周谷平等. 中国近代大学的现代化转型——移植、调适与发展[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 272.
- [17] 佚名. 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度报告[J]. 社会学界, 1933(7): 333-346.
- [18] 佚名. 前言[J]. 社会问题, 1936(1): 2.
- [19] 罗义贤. 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M].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05: 221.
- [20] 朱庆葆, 等. 教育的变革与发展[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93.
- [21] 陈远. 燕京大学(1919-1952)[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3.
- [22] 陶飞亚. 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136.
- [23] 燕京大学校友校史编写委员会. 燕京大学史稿[M].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9: 392.
- [24] 顾颉刚. 顾颉刚日记(第二卷)[M]. 台北: 联经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7: 128.
- [25] 田正平. 中外教育交流史[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2004: 739-741.
- [26] 陈滔娜. 哈佛燕京学社校企合作史[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
- [27] 陈观胜. 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C]//陈明章. 学府纪闻: 私立燕京大学. 台北: 南京出版有限公司, 1982: 53.
- [28] 山青. 燕京大学新闻学系过去及现在[J]. 报学杂志, 1948(2): 27-35.
- [29] [英]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增补本)[M]. 何兆武, 等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313.
- [30] 罗志田. 乱世潜流: 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原序)[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
- [31] 徐保安. 教会大学与民族主义——以齐鲁大学学生群体为中心(1864-1937)[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371.
- [32] [加]许美德. 中国大学1895-1995: 一个文化冲突的世纪[M]. 许洁英, 译.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1999: 53.

(下转第112页)